

从《天论》到《因论》:刘禹锡哲学思想的演进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摘要:《天论》与《因论》同为刘禹锡的重要哲学文献,而分别代表着刘禹锡哲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后者包括七个彼此独立而又相互支撑、相互映衬的寓言小品。它们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祸福、大小、利钝、声实等等)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系统而又深入地阐述了作者不断成熟、不断深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从而标志着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已演进到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声与实;用与藏
中图分类号:B24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303(2014)01-0001-07

作为集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历史人物,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其一,表现为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其二,在表述哲学思想时擅长运用文学语言和文学技巧;其三,习惯于将哲学思考的成果应用于现实政治,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提供哲学支撑。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占据唐代哲学思想的制高点。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创作于朗州的《天论》三篇和创作于夔州的《因论》七篇中。《天论》是刘禹锡在哲学领域中驰骋的起点。这一起点本身就具有那一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因论》则标志着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在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后,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从《天论》一路考察到《因论》,可以清晰地看到刘禹锡哲学思想的演进。

一、哲学与政治的联结:《天论》在哲学史上的双重意义

唐宪宗元和年间,永贞革新集团的核心成员刘禹锡与柳宗元联手与持有不同政见的韩愈展开了一场哲学论争。刘禹锡创作于朗州(今湖南常德)的《天论》三篇^①,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文

献,不仅提升到了这场论战的理论高度,而且以无可辩驳的周密论证给论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天论》的主要着力点在于通过论证天人关系,驳斥韩愈的“天人感应”说。刘禹锡将古往今来对天人关系的争论归纳为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即“天与人实影响”的“阴鹭之说”和“天与人实刺异”的“自然之说”。前者属于唯心主义有神论的范畴,后者属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刘禹锡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既要比韩愈的“天人感应”说更“唯物”,也要比宗元的“天人相异”说更“辩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从而占据了那一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制高点。

“天与人交相胜”的理论命题辨析了天与人的区别,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天与人各有其所能,各有其所用,不可以相互取代,却可以相互取胜,当然也可以相互作用。刘禹锡把天之能概括为“生殖”万物的自然演化功能,把人之能归结为“治理”万物的社会改造功能。“人能胜乎天者,法也。”这又强调了法制在天人关系中的关键作用,肯定了法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合理性。

收稿日期:2014-01-03

作者简介:肖瑞峰(1956-)男,江苏南通人,浙江省特级专家,教授,博导,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刘禹锡全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0-43页。

以哲学为基点,而以政治为落脚点,为永贞革新张目,为革新志士正名,这正是《天论》独到之处。换言之,将哲学思想与政治伦理相联结,从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视角,肯定永贞党人变革与刷新政治的诉求,这正是《天论》在哲学史上出现的意义。

不仅如此,《天论》的另一理论贡献在于,刘禹锡借此机会还继承与发扬前贤今彦的唯物主义思想,正面提出并阐发了万物“乘气而生”的自然观。在《天论》下篇中,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天人关系,把“天与人交相胜”的哲理发挥到极致,而且特意拈出“气”这一概念,将其视为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赋予其物质性,造成其实体化。他把作为世界万物存在之基础的“气”,区分为清气和浊气、阳气和阴气,以它们的组合与互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与变化。这又体现了自然观的一大进步,是《天论》出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另一重意义^①。

二、矛盾转化:回旋于《天论》与《因论》之间的哲学思考

《因论》七篇则创作于刘禹锡谪守夔州(今重庆奉节)期间,时间要后于《天论》十年左右^[1]。如果说这两篇文献代表着刘禹锡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的话,那么在高峰之间必然也有岗峦起伏,昭示着山脉的绵延不断。事实上,虽然在《天论》问世后,《因论》诞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刘禹锡没有撰写别的哲学论著,但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哲学思考,中断对辩证法原理的探究与应用。他将自己思考的成果如淡水着盐般融化在诗歌创作中,从而使其诗歌远比同侪富于哲理意味。

且看创作于朗州的《学阮公体三首》其一^②: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

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

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

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

作者通过对自身政治经历的回顾和反省,悟出:过去直道而行,涉世未深,难免为政敌的鬼蜮伎俩所欺。但“吃一堑,长一智”,过去的挫折可以作为

今后再战时的鉴戒。最后,作者以反诘语气昂扬地表示,要从失意中认识自我,发现有待改善的薄弱环节,以有利于下一轮的抗争。洋溢在诗中的是不以挫折为意、自期东山再起的高昂斗志和祸福相因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而其关键在于作者发现了矛盾的转化规律。

再看创作于夔州的《浪淘沙词九首》其八^③: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刘禹锡以淘金为喻,生动地揭示了从自身遭际中悟出的哲理:正如“狂沙”终究掩不住真金的光辉一样,任何美好的事物经过一番痛苦的“淘漉”后,终将战胜邪恶,赢得世人的认可和本该属于它的荣誉。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诬陷为“掩人以自售,近名以冒进”,“欺谩于言说,沓贪于求取”的小人,“始以飞谤成衅,终成公议抵刑。旬期之间,再投裔土”^④。此诚所谓“谗言如浪深”,“迁客似沙沉”也。然而,作者“身沉心不沉”。诗的前两句于句首冠以“莫道”、“莫言”构成排比句式,表现了作者对谗言的蔑视和对播迁的达观。后两句则以“狂沙”状政敌,“真金”喻自己,暗示挫折只能磨练自己的意志,最终被历史长河中的大浪淘去的将是那些“狂沙”般的进谗者。全诗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出发,既承认矛盾的发生,更着眼矛盾的转化,鲜明地打上了哲理思索的印记。

在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制导下,刘禹锡很少孤立地、静止地来看待问题,包括一己的困厄,而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把握矛盾转化的必然性,从消极现象中看到积极成分,从不利条件中找出有利因素,并以之慰勉和激励自己。这样,他就不至于像同时的柳宗元那样因无辜被贬而过多地叹惋,面对寒秋,他可以吟出“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的高亢旋律;身遭贬黜,他也可以发出“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的激越声调^[2]。

需要强调的是,刘禹锡这类诗中的哲理,不是抽象的说教,也不是空洞的信条,它总是附丽于诗意化的形象,从具体、生动的景物或事物中自然而然地萌发和跳跃出来,使人感到它是作者所描摹

① 详见拙作《〈天论〉与唐代元和年间的哲学论战》,载《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 《刘禹锡全集》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③ 《刘禹锡全集》卷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④ 《刘禹锡全集》卷10《上杜司徒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的景物或事物的特有内涵,而不是从外部硬贴上的标签。作者善于用洞烛幽微的慧眼来观察生活,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从合理中发现不合理,并把这种发现毫无保留地揭示给读者,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去观察,去发现。作者所乐于从事的一道工艺是:敲碎那些寻常事物的外壳,取出其不寻常的哲理内核。如《浪淘沙词九首》其六^①: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这首诗描写淘沙取金的劳动场面,这是遵循“题中应有之义”。淘金这一劳动本身并无不寻常之处,淘金者自己也绝不会意识到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许,他们只是把它当作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然而,习于哲学思考的作者却看到了它与“美人首饰侯王印”的联系,从而揭示出足以给人以启迪的哲理:金钿、金印等统治阶层用以相互夸耀的美好东西,都来源于底层民众的艰苦劳动;劳动中蕴藏着美,劳动更创造了美;离开了底层民众的创造,统治阶层的“奢华”便无从谈起^[3]。作者着意表现了淘金劳动的艰苦卓绝:不仅要早出晚归,披雾带霜,而且有葬身“浪底”的不测之虞。而这样艰苦的劳动又是由“女郎”担负的。这就含蓄地点出:统治阶层的奢华是建筑在底层民众的苦难之上的。诗的后两句隐隐流露了作者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这里,哲理渗透在诗意中,诗意又包含在哲理内。诸如此类的诗歌作品,既是刘禹锡从未停歇的哲学思考的艺术结晶,也为他在《因论》中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哲学探讨奠定了基础。

三、《因论》的写作宗旨:阐发哲理、评点政事和实验文体的有机统一

《因论》七篇^②其实正是刘禹锡多年来的哲学沉思的积淀。当然,刘禹锡在夔州的创作领域是宽广的,创作成就也同样是全面的。民歌体乐府诗及咏史怀古诗创作的突出成就,表明他在文学世界中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而《因论》七篇的写作,则意味着他在哲学世界中也取得了新的拓展与新的提升。

《因论》七篇包括《鉴药》、《讯毗》、《叹牛》、《微舟》、《原力》、《说骥》、《述病》等七个寓言小品。它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支撑、相互映衬,着重

从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祸福、大小、利钝、声实等等)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系统而又深入地阐述了其不断成熟、不断深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洵为用笔精警的传世之作。

禹锡在《因论七篇》引言中谈到其写作目的:

刘子闲居,作《因论》。或问其旨易归欤?对曰:“因之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无形,垂训于至当,其立言之徒;放词乎无方,措旨于至适,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因论》之旨也云尔。”

所谓“因论”,是指事有所由、言有所指、因事而发的议论。他自认为,这些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小品文既不同于“立言”者随意发端、旨在正面垂训的政论作品,也不同于“寓言”者任意想象、旨在侧面寄讽的虚构故事,而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的一种特殊文体。由此可以得知,作者把写作这组小品文当作一次文体实验,这正反映了他在文学创作中始终保持的探索与开拓精神。而从哲学的视角看,禹锡在《天论》中曾提出“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的观点,认为形有粗、微之分,人的认识有“以目而视”和“以智而视”之别。两相联系,或许可以说,所谓“造形而有感”尚属基于形体、“以目而视”的感性认识,所谓“因感而有词”则是脱略形体、“以智而视”的理性认识。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的信息是,以唯物论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前提,刘禹锡已经接触到、并且比较辩证地梳理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因此,这组小品文的贡献是双重的,跨界的,在文学与哲学两个领域都可以彪炳后世的。

《因论》七篇无一例外,都属于亲闻亲历之际“有感而发”的作品,在写作技巧上,采用一事一议、夹叙夹议的笔法,将感性认识寄寓在叙事中、理性认识升华在议论中。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者自己声称这组作品有别于“立言”者议论政事的文章,其实它们不仅没有回避现实政治,而且颇多指陈时弊的笔墨,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迥异于传统的政论文而已。这也就意味着作者是将阐发哲理、评点政事、实验文体这三重目的糅合在一起的。承载着如此多的功能与使命,《因论》

^① 《刘禹锡全集》卷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② 《刘禹锡全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4-48页。

七篇所负者重矣!

四、演进迹象之一:《因论》对“声”与“实”的辨析

在结构上,《因论》七篇都可以析为两段:上一段叙事,下一段议论。叙事时,大多以“刘子”领起,以示所叙之事非得之传闻,乃亲身所历。如《讯毗》一文^①在辨析“声”与“实”的关系时,便采用了这样的结构方式。上一段记叙说:

刘子如京师,过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斑白,挈羸角,赍生器,荷农用,摩肩而西。仆夫告余曰“斯宋人、梁人、亳人、颖人之逋者,今复矣”。予愕而讯云“予闻陇西公暘穀之止,方逾月矣。今尔曹之来也,欣欣然似恐后者,其闻有劳来之簿欵,蠲复之条欵,振贍之格欵,硕鼠亡欵,瘦狗逐欵”!曰:“皆未闻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盗间衅而武臣颀焉。牧守由将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鹤而轩。故其上也子视卒而芥视民,其下也鸷其理而蜂其赋。民弗堪命,是轶于他土。然咸重迁也,非阽危挤壑不能违之。曩者虽归欵成谣,而故态相沿,莫我敢复。今闻吾帅故为丞相也,能清静画一,必能以仁苏我矣。奉斯二必而来归,恶待事实之及也”。

“毗”,同“氓”,指百姓。文章精心设计了作者与道旁百姓的对话,通过举家西迁的百姓不堪诛求的倾诉,揭露了各级政府严赋重税、罔顾百姓死活的施政弊端。“其上也子视卒而芥视民,其下也鸷其理而蜂其赋”,上下均无爱民之心、悯农之意,把百姓视同草芥一般,非但不施仁政、不行善举,反倒刻意盘剥,竭泽而渔。于是,“民弗堪命”除了“轶于他土”外别无选择。写到这里,作者又加重语气强调说“然咸重迁也,非阽危挤壑不能违之”。是啊,华夏一族的子民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历来“安土重迁”,不到“阽危挤壑”的地步,绝不会擅离故土。而今选择举家西迁,岂不是说明他们在故土已无法生存?尽管西迁后依然有可能转死沟壑,而且西迁本身也有可能是一条不归之路,但毕竟可以给他们带来生存的希望。所以,西迁是他们仔细权衡生死利弊后所作的一种迫不得

已的决断。这样措辞,抨击苛政之意已呼之欲出。不过如果仅仅停留于抨击苛政,文章的题旨实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十分相近,并无太多新意,而宗元的《捕蛇者说》十多年前即已写成,假使作者就此搁笔,则显然未能跳出柳文的窠臼。至于以人物对话的方式来揭示题旨,亦属于陈陈相因的手法,从远处说,汉赋及汉乐府已肇其端;从近处说,诗如杜甫的《兵车行》、文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也都充分展示了运用对话来刻画人物和表现主题的高超技巧。因此,作者若想推陈出新,就必须另辟蹊径,使文章峰回路转,呈现新境。于是,就有了后一段深蕴哲理的议论:

予因浩叹曰:行积于彼而化行于此,实未至而声先驰。声之感人若是之速欵!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终终也。尝试论声实之先后曰:民黠政颇,须理而后劝,斯实先声后也。民离政乱,须感而后化,斯声先实后也。立实以致声,则难在经始;由声以循实,则难在克终。操其柄者能审是理,俾先后终始之不失,斯诱民孔易也。

作者由百姓对陇西公闻声向慕而纷纷迁居其管辖之地的现实景象,引申出“声”与“实”这一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从哲学抽象的层面辨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化的条件与规律,启发执政者如何正确处理“声”与“实”的相互关系,在适当的条件下及时促成其转化。这就不仅给文章涂抹上了浓郁的思辨色彩,而且将感性认知推行为理性归纳,提升了其理论高度。在作者看来,执政柄者只要处理好“声”与“实”之间的关系,做到“先后终始之不失”,就能深得民心。那么,“声”与“实”作为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究竟应该孰先孰后?作者认为,应根据不同的民情与政况灵活处理:“民黠政颇,须理而后劝,斯实先声后也。民离政乱,须感而后化,斯声先实后也”。前者的难度在“经始”,后者的难度在“克终”。这里,作者是在论述其对政事的独到见解,还是在阐发其对哲理的独特感悟,实在难以分辨,因为它们融为一体。

五、演进迹象之二:《因论》对“用”与“藏”的评说

《叹牛》一文^①在评说“用”与“藏”的关系时,

^①《刘禹锡全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采用了同样的结构方式与表现手法。上一段记叙作者与一位手牵跛足之牛的老叟的对话,展开故事情节:

刘子行其野,有叟牵跛足于蹊,偶问焉:“何形之瑰欤,何足之病欤?今穀觫然将安之欤?”叟揽縻而对云:“瑰其形,饭之至也;病其足,役之过也。请为君毕词焉。我僦车以自给。尝驱是牛,引千钧,北登太行,南至商岭。掣以回之,叱以耸之。虽涉淖跻高,穀如蓬而巢不僨。及今废矣,顾其足虽伤而肤尚殃,以畜豢之则无用,以庖视之则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闻邦君殍土,卜刚日矣,是往也,当要售于宰夫”。余尸之曰:“以叟之言则利,以牛言之则悲。若之何?予方窶,且无长物,愿解裘以赎,将置诸丰草之乡,可乎?”叟輒然而哈曰:“我之沽是,屈指计其直可以持醪而啗肥,怡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为?且昔之厚其生,非爱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恶之也,利其财。子恶乎落吾事”?

老叟当年役牛无度,驱使它“北登太行,南至商岭”,“掣以回之,叱以耸之”。凭借它赢得一家温饱。而今它身已老羸,又兼跛足,再也不能负重涉险,为主人赚取力资。老叟便想将它“售于宰夫”,以其一身皮肉换取妻儿衣食。作者闻言深悲牛之遭际,慨然表示愿意“解裘以赎”,将它“置诸丰草之乡”,得以安度晚年。但老叟却一口拒绝,并坦白了自己当年养牛、如今卖牛的动机:“昔之厚其生,非爱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恶之也,利其财”。这种只顾自己、不恤他人(物)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态度,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与联想,于是文章自然过渡到下一段的议论:

刘子度是叟不可用词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叹曰:所求尽矣,所利移矣。是以员能霸吴属,赂赐斯既,帝秦五刑具,长平威振,杜邮死,垓下敌禽,钟室诛。皆用尽身贱,功成祸归,可不悲哉!呜呼!执不匮之用而应夫无方,使时宜之,莫吾害也。苟拘于形器,用极则忧,明已。

作者思接千载,视通古今,由现实生活中这一“所求尽”则“所利移”的案例,联想到历史上居功赫

赫却惨遭最高统治者屠戮的伍子胥、李斯、韩信等名臣名将,在为他们一掬伤心之泪、并发出不平之鸣的同时,总结出“用尽身贱,功成祸归”这一永远无法打破的历史定律,昭示了以帝王为代表的政治人物的冷酷无情。这中间,毫无疑问也寄托了作者的身世之感。文章如果以此收束,已足具警世功用。但作者尚不满足,篇末又顺势引出一番有关“用”与“藏”的评说:应当“执不匮之用而应夫无方”,而不应当“拘于形器”。从而使文章上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

六、演进迹象之三:医学思想与哲学思想在《因论》中的交汇

值得注意的是,《因论》七篇中的《鉴药》和《述病》专就医药问题立论,从中既能感触到禹锡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也能体会到他的医学思想。在这两篇作品中,作者尤其注重把握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恰当的使用了阴与阳、利与钝、毒与效、过当与不及等矛盾对立概念,将有关治病服药的哲理揭示给读者。

《鉴药》一文^①在《因论》七篇中排序第一。所谓“鉴药”,是指从服药中吸取教训。“鉴”是引以为鉴的意思。作者自述了一次生病服药的经历:平日“食精良弗知其旨”,久而乃致“血气交沴,灼然焚如”,身体极度不适。于是前往就医。医生“切脉观色聆声”后,诊断说这是“兴居之节舛,衣食之齐乖”所导致的结果。便专门为他配制了药丸,叮嘱说“服是足以淪昏烦而除蕴积,销蛊慝而归耗气”,但其中有毒,切切不可多服,因为“过当则伤和”也。药丸果然有效,作者服用后“涉旬而苛痒绝焉,抑骚罢焉。逾月而视分纤,听察微,蹈危如平,嗜粝如精”。几乎已经康复。遗憾的是,作者此时却未遵医嘱,而听信了昧于药理的好事者的劝诱,为了巩固疗效,延时服用该药丸,并加大剂量。结果,“再饵半旬”后,“厥毒果肆,岑岑周体,如疢作焉”。不得不再度求医。又经过医生一番调理,才恢复如初。由此,作者领悟到:

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蹶,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作者以治病用药必须剂量适中为喻,说明处理任

^①《刘禹锡全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何事情都必须把握好分寸,如果超过一定的度,事情就会走向反面,所谓“过犹不及”也。文章的主旨可以用“过当则伤和”一语来概括^[4]。“和”者,阴阳平衡之谓也。“和”的对立面是“不和”或“伤和”。“和”与“伤和”这一对矛盾存在的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和”是相对的,“不和”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于疾病发生、发展、治疗、康复的全过程。由“不和”到“和”,表明其矛盾运动已实现动态的平衡;由“和”到“伤和”,则意味着原有的平衡又被打破。这里,作者虽未明言阴阳,但其实质是通过阴阳的变化来说明用药务求其本——阴阳之“和”。文章中叙述的三个阶段的病变均为阴阳失“和”所致,所以,必须始终依据阴阳调和这个“本”来决定用药服药的时限与剂量,才能达到新的不同层次的平衡。这也就是说,必须辩证用药、辩证施治。无疑,作者的这番议论,正是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医学上的具体运用。

《述病》一文^①也触及到事物的矛盾运动,特别是矛盾发展程度与事物运动状态的关系。文章据以立论的现实因缘是:作者与仆人同因暑热而患病,一开始作者的症状轻而仆人的症状重。但因为作者不注意调理,“口不能忘味,心不能无思”,所以症状虽轻、服药虽多,反倒迟迟不能痊愈。仆人则限于条件,“虽饮食是念,无滑甘之思”,且不以病患为意,“被病也兀然而无知,有间也亦兀然而无知”,结果竟早于作者康复。这当然也引发了作者的议论:

予喟然叹曰:始吾有斯仆也,命之理畦则蔬荒,主庖则味乖,颡颥则马瘠,常谓其无适能适。乃今以兀然而贤我远甚,利与钝果相长哉!仆更矣。刘子则遂言曰:乐于用则豫章贵,厚其生则社栎贤。唯理所之,曾何胶于域也?

这位仆人平时在蔬菜种植、饮食烹调、马匹喂养等方面都显得十分笨拙,但患病时表现出的那种“兀然而无知”的超脱姿态,却让作者自愧不如。于是,他悟得了利与钝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病症的轻重与痊愈的快慢并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患者的不同体质以及对待疾病的不同态度、服用药物的不同方法,都可能影响治疗效果,导致疗程长短的改变。这一独特认知和独特表述,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思想中的“整体

观念”和“变化观念”,也从哲学的层面上论析了利与钝的矛盾关系——事物运动的缓急是与矛盾发展程度紧密联系着的;当利与钝的矛盾处于胚胎形态时,运动尚比较平缓;矛盾演变到白热化的程度时,运动就会加剧,而矛盾的双方也就有可能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七、演进迹象之四: 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在《因论》中的融通

从哲学抽象的层面,借阐发哲学思想来寄寓自己的政治见解,刘禹锡在《天论》中已肇其端。《因论》援其绪而增广之,力求达到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的融通,以救治现实政治中的弊端。如在《鉴药》一文中,刘禹锡特别强调治病服药不能“循往以御变”。他认为,事物是始终处于运动变化状态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不能一味依赖既往的经验,执一而求,胶柱鼓瑟,否则就难以适应新的变化,无法做到因病施治、对症下药。譬如,“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蹶,明矣”。其实,又岂止治病服药是如此?治理社会及驾驭生民同样不能“循往以御变”。作者故意在篇末反诘说“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其真实意图正是为了将借鉴意义推而广之,使执政者也能从中受到启发,适当改善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遏制政治形态的进一步恶化。

又如在《述病》一文的篇末,刘禹锡基于“利与钝果相长”的认知,正面托出了“乐于用则豫章贵,厚其生则社栎贤”的政治见解。“豫章”为传说中的异木的名称。《神异经·东荒经》记载说:“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九州。其高千丈,围百尺,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条枝,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社栎”则喻指无所可用的“不才之木”,语出《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赅之百围……(曰:)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樅,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宋代名臣李纲《谢琼林苑赐御筵表》有句“伏念臣社栎散材,康瓠小器,力学粗知於忠义,逢时窃意於功名。”宋代诗人陆游《家园小酌》诗有句“池鱼往者忧奇祸,社栎终然幸散材”。清代诗人赵翼

① 《刘禹锡全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树海歌》有句“惜哉路险运难出,仅与社栎同全生”。皆用以指代无用之材。这里,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正因为利与钝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转化的,所以应当采取有效手段,努力使得钝者变利而利者更利。如果“乐于用”,“豫章”那样的奇异之材固然可以更显名贵;假使“厚其生”,“社栎”那样的无用之材也未尝不能彰其贤能。关键是要因材施教,量才为用,激发其潜能,促使其向好的有利的方向转变。这既是行医之道,又何尝不是为政之道?在作者对哲学及医学思想的辨析演绎

中,显然融入了他的执政理念,体现了其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的融通。

参考文献:

- [1] 卞孝萱. 卞孝萱文集第5卷[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 89.
- [2] 肖瑞峰. 刘禹锡诗论(修订版)[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233-235.
- [3] 吴汝煜. 刘禹锡传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205.
- [4] 卞孝萱, 卞敏. 刘禹锡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19-220.

From *Tianlun* to *Yinlun*— On the Evolution of Liu Yux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XIAO Rui-f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angzhou 310023 , China)

Abstract: Both *Tianlu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Yinlun* (Narrative Argumentations on Current Affairs) ar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writings by Liu Yuxi (772-842) , representing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e latter includes seven independent yet co-supporting and co-setting-off parable-style narrative argumentations , which discus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 and changes of , things from opposing aspects (fortune versus misfortune , bigness versus smallness , sharpness versus bluntness , voice versus merit) . They thus expound his gradually maturing and deepening thoughts on naive dialectics , indicating that Liu Yux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have attained new historical heights.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political thoughts; voice versus merit; application versus conservation

(责任编辑: 薛 蓉)